

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新辨

薛欣欣 朱丽霞

【摘要】明代文坛中,复古派前后七子与唐宋派之间的论辩一直是学界的热点研究话题,其中王世贞与唐宋派的互动关系尤为微妙。就王世贞个人而言,由于早年受到李攀龙宗派意识以及父难之祸的影响,他对唐宋派抱有较为鲜明的批判态度;晚年又因自身文学思想的成熟以及归有光的介入,体现出对唐宋派的宽容。就文学宗派的发展而言,唐宋派最初宗法前七子,发生理论转向后才与后七子分庭抗礼。故而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的变化历程,既反映出个人遭际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偶然性,又折射出文学集团内部对于新思潮从探索到吸纳的必然性。

【关键词】王世贞;唐宋派;个人遭际;历史书写

【作者简介】薛欣欣(1985-),女,山东济南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家族文学研究(上海 200240);朱丽霞(1966-),女,山东淄博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研究(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53~15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2&ZD159)的阶段性成果。

明代嘉靖年间的文坛才人辈出,文学流派异彩纷呈,这其中唐宋派与复古派前后七子的论争,一直是明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唐宋派的主要人物如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对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理论提出了批判,他们在宗法秦汉古文的基础上兼取唐宋古文之长,并在创作实践中力避佶屈聱牙的风气,为其时的诗文创作带来了清新的气息。李、何之后,李攀龙、王世贞重又接过复古的旗帜,七子派与唐宋派仍然各据文坛一方,延续着此前的僵持局面。对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与唐宋派的关系,历来学者要么认为是一以贯之的对立,要么于此语焉不详。王世贞对待唐宋派的态度,既是后七子文学旨趣的风向标,同时也不可否认渗透有他的主观好恶。作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王世贞的言行处事对复古派乃至整个文坛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对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的进一步梳理与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两个文学流派间的争鸣,还能从薪火相传的历史视角发现文学流派自身的演变

脉络,对于某些已有的成论也会生发出新的理解。

一、唐宋派的形成

活跃在嘉靖初年文坛的唐宋派,虽然在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往往被视作处于复古派的对立面,但其核心成员如王慎中、唐顺之,却都在早年倾心追随过前七子的步伐,可以说在文学观念的演变上,他们是经历了复古的洗礼之后才逐渐诞生了反叛的意识,并进而与原初的持见决裂。故而从师承的角度来说,唐宋派与后七子无疑拥有着共同的师法源头,可谓是“同源而异流”的存在。此前也多有学者就唐宋派源出复古派的相关史料做过不少考辨,本文于此不再赘述。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唐宋派在怎样的契机之下,大约在何时完成了这一文学思想的蜕变?换言之,真正作为文学流派意义上的唐宋派,又是如何诞生的?

李开先在《遵岩王参政传》中记录了王慎中从一意复古到兼取唐宋的这一重大转向,并指出他对于阳明心学的接受或是不可忽视的契机:“升任户部主

事,再升礼部员外,俱在留都闲简之区,益得肆力问学,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乃取旧所为文如汉人者悉焚之。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1]1945}王慎中于嘉靖七年(1528)授户部主事,嘉靖九年(1530)改任礼部祠祭司主事,也即是在这三年期间,与心学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使他不再囿于此前对宋儒的偏见,这就为他以后进一步从文学角度认可宋人文章,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如果说王慎中的唐宋转向是源于内因驱动,那么唐顺之则主要是受到了外因影响。作为前七子复古理论的忠实拥护者,唐顺之此前对自己的文学持见深信不疑,他的转变完全来自于王慎中的熏染:“(唐顺之)素爱崆峒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及遇王遵岩,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将变之机,闻此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故癸巳(1533)以后之作,别是一机轴,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尝不多遵岩之功也。”^{[1]1951}转变之后的唐顺之对唐代以后的诗文同样给予了充分认可,在写给王慎中的书信中,不难发现他对于北宋文学家曾巩和邵雍的推崇:“近来有一僻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然文莫如南丰,则兄知之矣,诗莫如康节,则兄亦且大笑。此非迂头巾之说,盖以为诗思精妙,语奇格高,诚未见如有康节者。”^{[2]299-300}

据学者考证,这封书信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综合考虑前文所提到的几处时间节点,可以推断约在嘉靖中叶,即16世纪三四十年代,王慎中、唐顺之二人便因志趣相投而彼此认可,开始摆脱前七子理论桎梏的束缚,公开提倡兼取唐宋的文学主张。那么是否可以据此断定唐宋派已经形成了呢?有学者在探讨文学流派的形成时指出:“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界定流派。流派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文学社团发展而成的流派;一种则是在一个或几个代表作家的吸引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创作风格的作家群,研究者据以归纳出的文学流派。无论是由文学社团发展而成,还是由研究者归纳而成,其成立标准其实是大体一致的,即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流派

统系、流派盟主(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3]18}由是观之,最迟不晚于嘉靖中叶,在王慎中和唐顺之的带领下,以倡导兼取唐宋古文之法的唐宋派便已经诞生,并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其中,活跃于嘉靖中后期的文坛,与复古派展开对峙。

二、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之交恶

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后七子复古派的形成要略晚于唐宋派。大约在嘉靖中期,这批年轻的进士意气风发,在文坛掀起了一股复古之风:“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4]7377-7378}此时的唐宋派诸家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政坛都可谓是浸染日久的前辈,尤其在文学领域,王慎中、唐顺之的文章还曾一度成为士人效仿的典范。伴随着后七子的兴起,唐宋派却逐渐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于鳞辈当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岷陵之文,而诗或为台阁也者,学或为理窟也者,于鳞始以其学力振之,诸君子竖意唱和,迈往横厉,齿利气强,意不能无傲睨。”^{[5]267}尽管王慎中于李攀龙还有师生之谊,但李攀龙并不认可他的文学持见:“晋江王慎中来督山东学,奇于鳞文,擢诸生冠。然于鳞益厌时师训诂学,问侧弁而哦若古文辞者,诸弟子不晓何语,咸相指于鳞‘狂生狂生’。于鳞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谁当狂者?’亡何,举其省试第二人。”^{[6]3914}李攀龙自己也在文章中批评王慎中、唐顺之为文不可取:“以余观于文章,国朝作者,无虑十数家称于世。即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今之文章,如晋江、岷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盛相掩。”^{[7]491}以李攀龙为盟主的后七子复古派,在指摘唐宋派文学观念的同时,还极力打压文学集团内部的持见相左者,以确保后七子复古理论的纯粹性,从这一点来讲,后七子复古派无疑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例如作为唐顺之弟子的吴维岳,不仅被后七子除名,更因为其身份的差异多次遭遇李攀龙不予面见的尴尬:“而峻伯数使候于鳞,辄谢病不复见。余得交关其间,以谓于鳞。于鳞曰:‘夫是膏

育者。有一毗陵在，而我之奈何？为我谢吴君，何渠能舍所学而从我？”峻伯不尽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谁肯为今者？且我曹何赖焉？我且衷之。”故峻伯卒而新都汪伯玉著状云：“济南以追古称作者，先生即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其独造盖有足多者。”所谓毗陵，则武进唐应德也。”^{[18]664}甚至在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中，也仅仅收录了唐顺之的八首诗歌，而王慎中则一首未收，这与大量收录前后七子作品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此不难发现他刻意复古的鲜明的宗派意识。

王世贞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由李先芳引介而结识李攀龙，他在入社时于文学主张各方面自觉向李攀龙看齐，元美自述云：“世贞二十馀，遂谬为五七言声律。从西曹见于鳞，大悔，悉烧弃之。因稍剜削下上，久乃有所得也。”^{[19]86}《艺苑卮言》作为王世贞早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其中对唐宋派文人既有“晋江毗陵藻税六朝之华”的肯定，也不乏指摘和批评，往往呈现出一种先扬后抑的态度：“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构华焕，巷空宛转，第匠师手不读木经，中多可憾。”^{[10]281}“晋江出曾氏而太繁，毗陵出苏氏而微浓，皆一时射雕手也。晋江开阖既古，步骤多赘，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逊曾氏也。毗陵从偏处起论，从小处起法，是以堕彼云雾中。”^{[10]235}又如他评价唐顺之：“近时毗陵，一士大夫，始刻意初唐精华之语，亦既斐然。中年忽自窜入恶道，至有‘味为补虚一肉，事求如意屡生嗔’；又‘若过颜氏十四岁，便了王孙一裸身’；又咏疾则‘几月囊疮是雨淫’；阅射则‘箭箭齐奔月儿里’；角力则‘一撒满身都是手’；食物则‘别换人间蒜蜜场’等语，遂不减定山。”^[11]如果说在《艺苑卮言》中王世贞对唐宋派褒贬结合，持论尚且公允的话，那么在私下友人间的书信往来中，则更多地显示出批判的倾向。根据徐朔方先生考证，王世贞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结识俞允文，此后他在给俞允文的信中对唐宋派的风行表示了不满：“仲蔚足下亡恙。长沙新建，据高收广，挟声起听，号为霸儒。逮迩晋江、毗陵欬起，创立耳观之辈蝇袭若狂，五鹿岳岳，畴能折角哉？仆每心语，未尝不扼腕发噫也。”^{[9]160}又如他在书信中附和攀龙，对唐宋派文人的批评和不屑可谓溢于言表：“足下所讥弹晋江、毗陵二公及其徒，师称而人播，此盖

逐影响寻名迹，非能心覩其是也，破之者亦非必输攻而墨守，乃甚易易耳。吴下诸生则人人好褒扬其前辈，爆发所见，此等便足衣食志满矣，亡与语汉以上者。”^{[9]2}袁宏道亦曾指出，唐顺之在当时为李攀龙、王世贞所不取：“有为王、李所摈斥，而识见议论，卓有可观，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武进唐荆川是也。”^{[12]695}至于归有光目王世贞为“妄庸巨子”一事，更是引发了一场二人乃至两个文学流派之间的互相攻讦，促成了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激烈对撞。王世贞结识李攀龙之前的文学主张，由于材料所限，或许尚难捕捉，但毋庸置疑的是，结社之后的王世贞受到李攀龙的极大影响，对唐宋派的批判要远大过褒扬。

王世贞与唐宋派的关系因为结交李攀龙而产生一变，更因为王世贞个人恩怨的介入而愈发变得紧张，因此本文在讨论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时，不仅要关注到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的导向作用，同时也特别注意他在个人感情支配下的人格独特性，希望以此来还原历史上真实而立体的王世贞。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时为蓟辽总督，嘉靖三十八年(1559)滦河失守，虏人大扰边境杀伤过当，王忬被弹劾练兵不力，次年，世宗一怒之下将他下狱论斩。关于王忬之死，学者们此前多有论断，一方面认为世宗对王忬的失望是主要原因：“忬才本通敏。其骤拜都御史，及屡更督抚也，皆帝特简，所建请无不从。为总督数以败闻，由是渐失宠。既有言不练主兵者，益大恚，谓：‘忬怠事，负我。’”^{[4]5399}另一方面，则由于王忬平素便与严嵩不睦，督边不力一事正巧成了严氏发难的把柄，王忬由此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笔者在此基本同意这一推断，但需要补充的是，在王世贞看来，严嵩固然是父亲冤亡的始作俑者，不可忽视的是这中间还有一名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个人恰恰是属于唐宋派的唐顺之。王忬过世后八年，王世贞在为父亲所作的行状中，暗示了唐顺之的所作所为：“郎有某生者久废，暴从幸臣文华起，乃以谓相嵩。相嵩复阳惊曰：‘边事弊乃尔耶？’于是指授兵部，疏令某生出按蓟卒所以不练状，而某生至则风府君曰：‘足下何所失相君指耶？’府君唯唯，既行驻昌平，再书贻府君曰：‘不佞将入矣，何辞以复相君？’府君曰：‘吾业已失相指，何复为？且某长者，吾不敢以污请。’竟不答，而某生入为疏，则盛言戍卒当练，不

宜以调发疲各边，而毁府君不事事。”^{[19]578}王世贞在文中虽未具体指名，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难判断“某生”即是指唐顺之。徐学谟更是加入了文人惯有的想象和夸张，将当时唐顺之趋附严嵩的情形描摹得绘声绘色：“比滦州大冏，诸中贵及官人家被伤者日号泣上前，上已心动，谕严嵩曰：‘忬不忠，理不可宥，非朕用人之不终也。’时已有诛意。及兵部郎中唐顺之行边，嵩饯之于直所，指饮意苡酒谓顺之曰：‘酒为王某所馈，酒则一年佳一年，官则一年不如一年也。’此或嵩偶然语耳，而顺之误信嵩必欲中忬。比行边回奏，于论忬处参语独多。先托其门生白启常呈嵩于世蕃，世蕃诧曰：‘若王某如唐君所言，即当就擒矣。’稍为更削其草，止存‘一卒不练’等十六字。”^{[11]337-338}朱国祯则在《涌幢小品》中指出王忬与唐顺之其时已有隔膜，这不仅为王忬罹难埋下了祸根，也使得此后王世贞厌恨唐顺之成为可能：“先生以郎中差往蓟州阅视士兵，时总督则思质王司马也。先生自以学达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辈也，出山任事，目中已无司马。司马自以名位已重，主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时立业，视先生为下僚老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马受祸，弇州兄弟以‘一卒不练’之旨，归怨先生。”^{[14]419}因严嵩党羽赵文华举荐而出仕的唐顺之，按边期间还与严嵩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参与了严嵩的陷害活动，故而在整个父难过程中，难免会招来王世贞的怨愤。

也许正是由于与唐顺之的结怨，使得王世贞对唐宋派的其他成员也心存芥蒂，至此王世贞与唐宋派的关系便又恶化了一步。黄景昉曾对王忬事件做过较为公正的评判。他认为唐顺之虽是无意而为之，但造成了王忬的冤杀确也是事实，同时他还提到王世贞对此事耿耿于怀，并以文学为武器向唐宋派发起了攻讦：“王忬得祸缘唐顺之。唐起兵部，稽核蓟、辽师，负宿学，而王亦以早贵功高，嘍喑不为下。因有‘一卒不练’谤，世庙素绳边吏严，唐虽无意杀王，所云‘伯仁由我而死’。其子世贞恨甚，不便声及，姑借古文辞发端，诋晋江、毗陵不置。无论晋江显属介僮，即毗陵亦阴寓报复，非仅作文字观已也。同时五子俱坠王云雾中，所谓借文报仇。”^{[15]196}由于对唐顺之的推崇，致使茅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波及：“（茅坤）少尝寤寐龙门，而出入昌黎、庐陵间，若相

授受者，于当代慎许可，独输心于毗陵。自济南、琅琊数公起，而论相左矣。琅琊更以家怨诋毗陵，因诋公，辄形于文。”^{[16]1475}整个事件的孕育和发酵可谓像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王世贞、唐顺之二人虽然都未就此事做过正面回应，但王世贞的影响力之大，足以使整个文坛为之侧目和声援，甚至影响到唐顺之的政治声誉，呈现出一种对他压倒性的声讨。随后唐顺之亦于同年离世，但是他的晚节名声在这样的一场口诛笔伐中几于不保。

三、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之缓和

如果说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的交恶是由于其成员唐顺之，那么王世贞同唐宋派关系的和缓，恰恰也是因为其成员的参与，此人即是唐宋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归有光^①。王忬去世的次年，归有光应吴地士大夫所托，摒弃了与王世贞因文学持见相左而产生的不快，为他的父亲撰写了《思质王公诔》，并感慨道：“呜呼哀哉！疆场之事，何岁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如转圜走。先公鼎贵，公仍其后。两世同官，复凌其右。继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谁能无垢。”^{[17]683}他在诔文中既表达了对王忬罹难的同情，同时也对王世贞兄弟二人给予了称许，可见此时归有光与王世贞的关系已初露缓和之机。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以六十岁高龄得中进士后授官长兴县令，王世贞还特意赋诗《送归熙甫之长兴令》以壮其行，此后两人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归有光去世后，王世贞还为他作了像赞：“赞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剪缀帖括，藻粉铺张。江左已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8]179}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归有光的文章，王世贞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虽然像赞的原话经钱谦益改换后已成为一段公案，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对此也进行过辩驳，但王世贞在赞语中对归有光的认可是真实的，当年关系紧张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晚年的两人终于握手言和，大有鲁迅先生所云“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意。

隆庆四年(1570)李攀龙去世，王世贞成为实际执掌文坛的盟主，父难的影响以及心态的变化，使他逐渐褪去了早年尖锐的锋芒，不再乐于仕途，而是退居到弇山园中过起了闲散悟道的生活。与心境的转变相契合，这一时期王世贞的文学创作，早年的现实主

义风格逐渐隐退,富于闲适气息的作品则悄然增多,他的文学主张以及出处行事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改观,加之归有光所起到的良好作用,王世贞与唐宋派的关系也开始渐见缓和,不仅对唐宋派的打压消失了,而且与后期唐宋派文人的交游也日益增多,甚至还一定范围内肯定了他们的文学思想。当是时,唐宋派的中坚王慎中、唐顺之均已谢世,对于曾经颇有怨恨的唐顺之,王世贞收敛起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并对唐顺之的仕途不顺表示同情。在《首辅传》中他指出唐顺之加入严嵩麾下,乃是迫于境遇的潦倒无奈,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所为,而非主观意愿:“(严嵩)晚节知天下人怨之,间舍旧郗而收录知名士,若故编修唐顺之、中允赵贞吉等皆以沦落为感,不自觉入其彀。”^{[18]72}他还在心学的角度认可了唐顺之的才学:“罗达夫、唐应德材高而亦能尊文成公学而稍出入焉,时时过从,公与之扬扝,青衿受业者众。”^{[18]72}虽然他本人未曾直接在文献资料中留下任何与唐生冰释前嫌的文字,但在他的儿子王士骥那里,我们解读到了隐藏在背后的王世贞:“或谓顺之失身严氏,且有怨于子之先人,何轻吐其不平也。顺之失身严氏,意者枉尺直寻乎?于时九边练兵,总之寻常套数,顺之胸中素具甲兵,以实求之,未免求全于蓟镇而不知九边之皆然也,何私怨之有?士大夫不要钱、不怕死、不求做好官,一腔热血每恨挥洒之无地,此何为者?不过欲以身殉国耳。臣不佞,深有感于顺之也。”^{[19]433}这番翻案之语不仅没有将唐顺之作为王氏的罪人来看待,更难能可贵的是还肯定了唐顺之一心为国家着想的精神,可谓是对流传已久的“王唐之隙”说做出了最终的回应。可以想见王士骥此语的背后,无疑是王世贞在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所致。至此唐顺之的功业才得到了肯定和认可,晚节问题也重又得到了更正,王世贞与唐顺之的恩怨也就此告一段落。

至于唐宋派的其他文人,王世贞也与他们恢复了正常的文学交游,他曾自述与茅坤父子均有交情,并称赞茅坤在文学之外亦有才术:“吴兴有茅鹿门先生,其居官所,至负才术,顾厄于谗,不获究,归而以文学收远近声。其伯子翁积能嗣茅先生为文,而以不胜任侠天,父子余俱识之。”^{[18]702}茅坤将自己的文集付梓后曾赠予王世贞赏鉴,得到了王世贞的高度评

价:“承大海淳淳,拜诵《白华楼续稿》,神气殊王,毗陵之后,主盟独公矣。《史记》题评斟酌二君,更自有人心语,异时倘有所进,固公之余惠也。”^{[18]716}在给吴国伦的信中,王世贞也表现出对王慎中诗文的兴趣:“王道思遗诗文,烦为访录,全本相寄。”这种出于纯粹文学层面的探讨和往来,摒弃了前嫌和派别之见,似乎更能抵达文学的真实本质。

四、余论

回顾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的整个脉络,王世贞年少气盛时在李攀龙的影响下形成了最初的文学价值观,由于受到宗派意识的局限,对“非我族类”的唐宋派持有排外的倾向;中途历经父难之祸,牵涉到唐宋派文人唐顺之,因而难免沾染有个人主观情感,在品评之时陷入了因人废言的极端;后又因与归有光的交往以及心境的趋于平和,最终与唐宋派恢复了正常的文学往来。故而从王世贞与唐宋派的交往过程来看,个人交游和政治事件是促成他对唐宋派态度发生转变的两大重要因素,这是他在复古派与唐宋派论争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个体独特性。然而王世贞的言行举止同样体现出后七子文学价值观的共性,整个文学流派的宗旨并没有因为王世贞个人行为的介入而发生大的理论转变,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的起落离合,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折射出了后七子复古派与唐宋派的角力争锋。

如果将后七子与唐宋派共同置于明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视野下,从流派属性以及理论创见的角度来综合分析,又会发现历来被认为是处于互相对抗状态的这两个文学流派,其实具有颇多共性:论源头,皆由于对前七子的效法;论崇尚,又不出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的追随。可以说作为复古主张的拥护者,后七子与唐宋派似异而实同,他们之间的论争与其说是文学流派之间的抗衡,倒不如说是文学集团内部的探索与修正,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古文家虽抛弃了秦、汉的偶像,却仍搬来了第二批偶像‘唐、宋八家’等,以供他们崇拜追摹的目标;依然不曾脱离掉广大的奴性的拟古运动的范围。不过,由艰深而渐趋平易,由做作过甚而渐趋自然,却是较近人情的一种转变耳。真实的完全摆脱了‘迷古’的迷障的,确要推尊到公安派的诸作家。”^{[20]801}唐宋派虽师承前七子而来,却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放眼文坛,在与当时

流行的心学思想发生碰撞后,发现了复古理论的偏颇与失衡,故而在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方面逐渐与前七子复古派分道扬镳。而李攀龙、王世贞所引领的后七子文人,则未能认清文学发展的趋势,仍然遵循着已有的旧制而不加改变,任何对前后七子复古理论的非议都有可能招致他们的不满和攻讦,以至对稍有逾矩如吴维岳者,竟然也被后七子阵营除名。可见后七子在文学主张方面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远不如唐宋派包容。

王世贞初入文坛时年轻才盛,涉足文坛的经验并不丰富,难以对文学发展的宏观进程有清晰的把握,加之李攀龙的强烈影响以及宗派意识,故而这一时期王世贞对唐宋派的批驳,更多呈现出的是集体色彩,代表了后七子对文学集团内部新变的质疑与拒绝;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成为文坛的实际领袖,丰富的文坛经验使他逐渐认清了未来的发展趋势,理解并认可了集团内部产生的新思潮,因而这一时期王世贞对唐宋派的宽容,展现出了他的个人意识,更为文坛今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导向。钱谦益曾评价王世贞:“少年盛气,为于鳞辈撈笼推挽,门户既立,声价复重,譬之登峻阪、骑危墙,虽欲自下,势不能也。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歇,浮华解驳,于是乎泮然汗下,遽然梦觉,而自悔其不可以复改矣。”^{[21][436]}牧斋此语或许并不能完全概括王世贞一生的文学取舍和走向,但从反映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的角度来说,还是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的。

王世贞对唐宋派,经历了从原本的典论平实,基本公允,到唐顺之事件带来的因人废言,有失偏颇,再到抛却私人恩怨之后的重回正轨,倾心相折。由此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王世贞作为文坛盟主的巨大影响力,更看到了一个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的王弇州,他的文论主张并非一成不变的泥古不化,而是富于积极吸纳与自我更新的能力,这也恰恰是容易被我们的程式化思维所忽略的一点。从这一意义来讲,本文所探讨王世贞与唐宋派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展示了个人遭际在文学争鸣中的历史印记,更体现出王世贞作为宗主对文坛新风从迟疑到接纳的变化过程,这是他文学思想成熟之后的自然选择,更是文学复古运动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注释:

①有学者指出归有光并非唐宋派代表人物,本文姑从旧说。

参考文献:

- [1]李开先.李开先全集[M].卜键,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2]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M].马美信,黄毅,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 [3]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王世懋.王奉常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 [6]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
- [7]李攀龙.沧溟先生集[M].包敬第,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8]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9]王世贞.弇州四部稿[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王世贞.艺苑卮言[M].罗仲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
- [11]王世贞.增补艺苑卮言[M].明万历十七年武林樵云书社刻本.
- [12]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3]徐学谟.世庙识余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4]朱国祯.涌幢小品[M].王根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5]黄景昉.国史唯疑[M].陈士楷,熊德基,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6]茅坤.茅坤集[M].张梦新,张大芝,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17]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周本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8]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9]王士骥.皇明驭倭录[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0]郑振铎.中国文学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 [2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